

论“全球南方”视角下土耳其的战略自主^{*}

陈利宽 潘少鹏

摘 要：“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特征。作为“全球南方”国家成员，土耳其的战略自主表现为经济上强化政府干预与重视传统价值和独立性、政治上独立自主探索国家发展道路、文化上回归伊斯兰世界和增强族群认同、防务上加快国防工业发展以促进防务自主以及外交上推进外交政策转型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球南方”国家的兴起为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国家实力提升带来的认知变化是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的根源；美西方国家的态度是土耳其战略自主的推动力。战略自主有利于土耳其在大国竞争中的外交转圜，既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政策空间和利好，也加速了本国与非“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变革。尽管受“全球南方”整体发展态势的影响、非“全球南方”国家的约束以及国内因素的制约，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仍引导着土耳其的内政和外交转型，土耳其会继续靠近“全球南方”国家，达到多方平衡。

关 键 词：“全球南方”；土耳其；战略自主；大国博弈；土美关系

作者简介：陈利宽，博士，延安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副教授（延安 716000）；潘少鹏，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2024 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37）。

文章编号：1673-5161(2025)03-0053-28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 202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4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中东关系史研究”（24VLS024）、延安大学专项计划资助项目“文明交往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2023WHZX-004）和延安大学 2023 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战略自主研究”（YCX2023066）的阶段性成果。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特征。这类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显著提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大国博弈的展开,一些曾经追随美国、受美国左右的“全球南方”国家有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日益表现出战略自主的倾向。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中发展较快、实力较为突出的地区大国,土耳其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表现得越来越活跃,引发各界的广泛关注,土耳其的一系列做法可以置于战略自主这一目标下进行审视。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是审视“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发展趋势的关键切入点,能够充分彰显这类国家战略自主的普遍性和典型性。

目前,学界对土耳其战略自主展开了多维度的研究。首先,关于这一议题较为丰富的研究集中于土耳其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层面。有学者认为土耳其疏远美西方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①其次,土耳其作为中等强国的崛起是战略自主的实力基础。有学者认为土耳其利用在东西方平衡的中等强国身份在国际舞台上施加话语权和影响力也体现了一定的自主性;^②再次,有学者从土耳其影响周边和地区事务角度对于战略自主的具体表现展开研究;^③最后,还有学者认为土耳其通过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发展关系来表达战略自主诉求。^④ 这些研究为本

① Jakob Lindgaard and Moritz Piper, “Turkey’s NATO Future: Between Alliance Dependency, Russia, and Strategic Autonomy,” *DIIS*, Copenhagen, 2020; Tamseel Aqdas, “The Rise of NeoOttomanism in Turkey for Strategic Autonomy in Liberal World Order,” *Journal of Security and Strategic Analyses*, Vol. 9, No. 1, July 2023;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Western Order: Strategic Autonomy or New Forms of 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 4, 2021; 郭长刚、梁莹莹:《土耳其与北约关系:战略自主还是联盟至上》,载《西亚非洲》2023 年第 1 期。

② 丁工:《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第 5 期; 黄忠、宋晓丽:《“关键中间国家”的多边联合外交》,载《现代国际关系》2024 年第 9 期; Buğra Süssler, “Turkey: An Emerging Middle Power in a Changing World?,” *LSE IDEAS Strategic Update*, May 2019.

③ Hakan Yapar, “From Strategic Depth to Blue Homeland and Beyond: Understanding Turkey’s Drift Towards Greater Strategic Autonomy,” *Opinion Paper*, IEEE 40, 2021; Alberto Gasparetto, “Transition and Middle Power: Turkey’s Strategic Autonomy on the Atlantic Area Border with the Middle East,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Horn of Africa,”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1.

④ Veyssel Tekdal, “Greater Autonomy Through Closer Relations with China? Revisiting the Turkey-China Engagement,” *Oasis*, 2023; Orhan Gafarlı and Julia Roknifard, “Relations with Russia in The Context of Turkey’s Policy in Constructing Its ‘Strategic Autonom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79, 2023.

文提供了扎实的研究基础,但仍然停留在土耳其外交转型层面的分析。因此,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兴起和土耳其战略自主诉求的提升,有必要系统和全面地分析这两者的互动关系。鉴于此,本文试图探究土耳其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在追求战略自主方面的表现、动因、影响以及有限性,并对土耳其战略自主的未来图景进行展望。

一、“全球南方”兴起与土耳其的定位

“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成为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特征,框定了土耳其战略自主的大环境。“全球南方”这一概念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具有战略自主的新追求,而土耳其在战略自主方面的作为理应成为一个关键切入点。

(一) “全球南方”的缘起与战略转型

“全球南方”概念并无明确的界定,而是逐步从一种地理或地域概念向经济和政治融合概念过渡,体现出这类国家各种诉求的增加。在本文中,“全球南方”国家指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底色是独立自主、历史使命是发展振兴、共同主张是公道正义,这是审视“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1969年,美国作家和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elsby)开始使用“全球南方”这一概念。^①进入21世纪,受益于全球化,一些南方国家发展迅速,相互间联系日益紧密。2001年,美国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Jim O' Neill)提出“金砖四国”(BRIC)概念,用来特指新兴市场国家。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题为《打造“全球南方”》的报告,周一平在报告的序中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属性上各不相同,但都面临一系列的脆弱性和挑战”。在报告中,中国也被视为“全球南方”国家之一。^②2006年,高盛又提出“新钻十一国”(N-11),这些国家成长潜力仅次

^① Stewart Patrick and Alexandra Huggins, “The Term ‘Global South’ Is Surging. It Should be Retired,”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ugust 15, 20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3/08/15/term-global-south-is-surging.-it-should-be-retired-pub-90376>, 上网时间: 2024年1月27日。

^② *Forging a Global South*,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s, December 19, 2004.

于金砖国家。随着“金砖国家”和“新钻十一国”的崛起,“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迅速攀升,而金砖国家的多次扩容也体现出这类国家团结合作与联合自强的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9 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 GDP 占世界 GDP 的比重就已经达到 50.6%,而发达经济体占世界 GDP 的比重到 2024 年已经降至 40.17%。^① 此外,经过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并逐渐改变其处于全球治理体系外围的不利状况,并且致力于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将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提高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② 在俄乌冲突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一些“全球南方”国家采取了与美西方国家不同的政策立场,展现出战略自主的态势,由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 土耳其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角色与定位

“全球南方”国家的兴起是指一批具有相似特征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开始发挥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而土耳其便是其中的一员。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是“全球南方”成员中具有较强的国家实力和拥有战略自主偏好与行动的典型代表。

土耳其作为中等强国崛起,成为了“全球南方”国家中实力较为强劲的一员。从经济实力上看,受益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土耳其经济发展成就日益显著。在正义与发展党(后文简称“正发党”,AKP)执政初期,土耳其已经发展为新兴市场国家,被视为“展望五国”(VISTA)和“新钻十一国”的成员,并且加入了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③。与此同时,土耳其还多次表示有意愿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并正式提出申请。从军事实力来看,土耳其是北约(NATO)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力量,也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强国。通过发展

① “GDP Based on PPP, Share of World,” IMF, October 2024,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profile/OEMDC/WEO>, 上网时间:2024 年 11 月 20 日。

② 黄超:《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全球南方”的时代内涵》,载《世界经济研究》2023 年第 9 期,第 9 页。

③ 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自发组织的利益联合体。这些国家有经济增长较快、外交理念相似、利益诉求相近的共同特点,有着寻求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的共同战略目标,都希望通过推动多边合作争取更大的权利和责任,倾向于运用积极的和平手段在国际舞台上施加影响力和话语权。

本土国防工业,土耳其正在减少对美国的军事和安全依赖。从文化方面来看,土耳其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国家”,被美国视为伊斯兰世界的民主样板,重视伊斯兰文化和突厥语国家传统价值。从外交层面来看,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并未积极响应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措施,倾向于采取一种灵活和自主的策略,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由此,土耳其正在从一种追随西方的被动角色转变为一种发挥建设性作用、追求战略自主的“全球南方”角色。^①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领导下的土耳其开始“脱亚入欧”,学习西方。冷战开始后,土耳其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安全与北约捆绑,并且要求加入欧盟(EU)。然而,土耳其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和欧盟的候选国,却并未完全遵从美西方的要求,体现出战略自主性偏好和具体行动。冷战时期,土耳其就对北约提供的防务安全产生了不满和疑虑,开始发展本国的国防工业,追求防务自主。正发党执政后,随着土耳其作为中等强国的崛起,土耳其的战略自主性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层面更加凸显。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的加剧,土耳其与西方盟友在俄乌冲突、新一轮巴以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凸显,战略自主的步伐逐渐加快。

二、土耳其战略自主的表现

国家战略自主性是指在不对称同盟中,盟国能够违背主导国的意愿甚至抵抗其施压,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自主做出战略选择,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四个领域。基于以上判断,本文认为土耳其的战略自主指的是它能够不受美国支配,独立处理本国内外事务,从而实现自己国家目标的意愿和行动。如前所述,土耳其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中发展势头较为强劲的一员,不可避免地会与美西方国家产生分歧和矛盾。土耳其经常能够违背主导国的意愿甚至抵抗其施压,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自主做出战略选择,具体表现在经济、政治、

^① 根据霍尔斯特蒂的说法,角色概念包括决策者自己对适合其国家的一般决定、承诺、规则和行动的定义,以及其国家在国际体系或下属地区体系中应持续发挥的职能。参见 Kalevi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4, Issue 3, 1970, pp. 245-246。

文化、防务和外交层面的自主性追求,这也是“全球南方”国家战略自主的重要切入点。

(一) 经济上: 强化政府干预, 重视传统价值和独立性

在土耳其寻求战略自主和大国地位的过程中,经济始终是核心内涵和关键基础。虽然经济规模不如金砖四国,但由于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和影响力提升而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和“近金砖国家”(near-BRIC)的代表。^① 学界关于土耳其经济层面的研究往往关注经济发展的成效和危机,但客观来讲,土耳其经济发展和变革的背后有着反对西方、寻求战略自主的隐含逻辑。

在对待外部规范性力量时,土耳其并未完全受其支配,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在“全球南方”国家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WB)等机构不公平地将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西方国家。^② 长期以来,土耳其依赖外部资本导致经济脆弱性不断上升。^③ 然而,21 世纪前期的经济增长重塑了土耳其与国际经济机构之间的关系,相关机构对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与规范能力大幅减弱。^④ 在土耳其遭遇里拉贬值和通货膨胀危机时,土耳其并未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寻求援助,反而向一些阿拉伯海湾国家寻求货币互换和贷款。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指出,国际贷款应该以黄金为基础,应该将国家从美元的压力中拯救出来,因为黄金从来都不是压迫的工具。^⑤ 土耳其同意用卢布购买俄罗斯能源,使用俄罗斯自主开发的 MIR 支付系统,这意味着土耳其帮助俄罗斯反制欧盟,实现“去美元化”,冲击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埃尔多安赢得大选后,任命具有西方教育背景和从业经验的财长、央行行长,试图采取更符合“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货币政策,吸引西方

① Ziya Öniş and Mustafa Kutlay, “Rising Powers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urkey in the Age of BRIC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4, No. 8, 2013, p. 1409.

② Harry Clynh, “The Ankara Consensus: How Turkey Is Boosting Influence in Rising Africa,” *African Business*, February 6, 2024, <https://african.business/2024/02/politics/the-ankara-consensus-how-turkey-is-boosting-influence-in-rising-africa>, 上网时间:2024 年 6 月 9 日。

③ Ziya Öniş and Caner Bakır, “Turkey’s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Age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U Anchor,”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Vol. 12, No. 2, 2007, p. 156.

④ 邹志强:《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危机与转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9 页。

⑤ “Turkey Joins Other Nations Flocking from US Dollar Hegemony,” *Mint Press News*, April 21, 2018, <https://www.mintpressnews.com/turkey-joins-other-nations-flocking-from-dollar-hegemony/240867/>, 上网时间:2024 年 4 月 6 日。

国家投资,但这一措施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土耳其仍面临政府赤字、高通胀和里拉不断贬值的困境。在此情况下,2024年9月2日,土耳其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很大原因在于土耳其希望通过同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贸易中获益,摆脱现有的经济困境。

此外,土耳其经济政策呈现出受到伊斯兰资本影响、国家干预增强的特征,并与埃尔多安的威权主义相适应出现保守化倾向。正发党政府在经济领域推行更为深入的改革调整措施,既重视全球化和融入世界经济,又支持伊斯兰传统价值。相对保守的安纳托利亚新兴工商业阶层快速壮大,成为传统世俗的西部大企业集团之外的新经济力量。土耳其私人资本领域形成了以工商业联合会和独立工商业联合会为代表的两强并立格局,为土耳其经济注入了温和伊斯兰主义色彩。^① 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削弱了美国和欧盟的经济,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不足,并加速了全球权力向中国和新兴世界转移的进程。随着土耳其经济持续不振,这意味着以往经济治理模式的失灵和失效,代表着新自由主义理念及其治理实践在土耳其面临失败和终结,土耳其需要进行新的经济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和转变经济结构。为此,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中的角色进一步凸显。2023年,埃尔多安领导下的正发党再次赢得大选,传递出主张在经济领域加强国家控制的国家主义传统复兴和背离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趋势。^② 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抑制通货膨胀的办法是增加利息。然而,埃尔多安认为低利率才能对抗高通胀,可以促进生产、就业和出口,还批评高利率违反了伊斯兰教义,并加剧了贫富差距,宣称要打一场“独立的经济战争”,这被称为“埃尔多安经济学”。^③ 埃尔多安通过独特的利率调控政策为土耳其这个新兴经济体应对通货膨胀提供了新的思路,短期内带来了制造业景气、失业率下降,是一次试图突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的激进尝试。有学者将土耳其的经济政策解读为新兴经济体争取独立发展的尝试和新自由主义在土耳其的

① 邹志强、俞海杰:《理想之治与现实之困:土耳其“百年愿景”的经济成效评析》,载《西亚非洲》2023年第6期,第78页。

② 魏敏:《“埃尔多安经济学”和总统制下土耳其经济政策走向——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视角》,载《土耳其研究》2018年第1期,第37页。

③ “埃尔多安经济学”一词最早出现于2016年2月《经济学人》杂志,后来发展为经济学界对埃尔多安政府经济政策主张的指称。

边缘化。^①

除此之外,土耳其也推出一系列积极的工业战略和经济发展模式,表明土耳其注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致力于将土耳其打造成“全球制造业中心”。土耳其于 2011 年提出的“2023 年愿景”战略规划,其主要目标是使土耳其成为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国。2021 年,土耳其提出了关于扩大出口、提高就业的“新经济模式”。埃尔多安表示,外汇在该国总债务存量中的份额将被削减,以降低其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减少土耳其对进口的依赖,优先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出口。^②

总之,加强政府干预、重视传统价值与国家独立性是土耳其战略自主的重要体现。土耳其在经济层面的举措突出了其作为“全球南方”国家成员力图突破美西方经济控制的现实诉求。

（二）政治上：独立自主探索国家发展道路

对本国发展模式的自信与自觉体现出“全球南方”的政治觉醒,这些国家应结合自身国情,独立自主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③ 二战后,伴随土耳其倒向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而来的是其政治发展模式的西方化,在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影响和干预下,土耳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影响。进入 21 世纪,信奉凯末尔主义的传统政治精英逐渐被边缘化,而拥有广大民众基础的正发党上台。正发党在政权稳固后,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开始突破西方国家所设定的民主化范式,出现了显著的政治转向。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土耳其开启了摆脱西方资本和外部政治势力的干涉、追求自主的发展道路、打造自主的政治模式的时期。

埃尔多安通过修宪削弱了军权和司法独立权,增强了中央集权。2014 年 8 月,埃尔多安当选总统后便开始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政治转型。2016 年 7 月

① Özgür Orhangazi and A. Erinc Yeldan, “Turkey in Turbulence: Heterodoxy or a New Chapter in Neoliberal Peripheal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54, Issue 5, 2023, pp. 1-29.

② Tuba Sahin, Gokhan Ergocun and Yunus Girgin, “Turkey Announces Landmark New Economic Reform Package,” *AA News*, March 13, 2021, <https://www.aa.com.tr/en/economy/turkey-announces-landmark-new-economic-reform-package/2173910>, 上网时间:2024 年 5 月 20 日。

③ 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载《国际问题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67-68 页。

15日的未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清除政治异见,暂时中止执行欧洲人权公约,并且考虑恢复死刑。这表明土耳其并未按照欧盟的期待来进行自由民主改革。与此同时,土耳其通过全民公投将国家政体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埃尔多安也成为第一位土耳其的民选总统。这种总统制具有鲜明的土耳其特色,总统作为行政首脑和国家首脑,在行政、司法领域具有主导地位。土耳其的一系列做法实际上正在背离美国所倡导的西式民主,自主发展意识增强,开始要求独立自主地探索国家发展道路。

正发党执政以后,土耳其通过加快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改革进程,开始发展温和的伊斯兰民主,削弱军方力量、确保正发党作为温和伊斯兰政党执政的稳固地位。尤其是在2016年的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加大了对军方的改革和削弱力度:将陆、海、空三军划归国防部直接领导;宪兵部队及海岸警卫队划归内政部领导;军队医院则划归卫生部领导;成立的军校也直属国防部领导;减少国家安全委员会及最高军事委员会中的军人名额等。^① 这些措施通过削弱军队在土耳其的影响力,强化了政府尤其是总统本人对军队的控制,也为埃尔多安推行总统制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看,土耳其认为照搬西方政治发展模式并不能解决政治危机,走上了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的政治发展之路,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建构、法治和民主之间的平衡,这样的政治转向冲击了西式民主化的原有模式,导致既有的民主化色彩减弱,政治权力开始集中。

(三) 文化上: 回归伊斯兰世界, 增强族群认同

土耳其通过找回伊斯兰国家和突厥语国家的身份来彰显本国的文化认同,进而在更深的精神层面为战略自主获取合理性来源。

土耳其强调尊重宗教传统价值观,积极推动土耳其与伊斯兰国家和突厥语国家的联系。伊斯兰特征也开始渗透到社会文化领域,逐渐改变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效仿和追随态度。土耳其高调庆祝“攻占君士坦丁堡”胜利纪念日和先知的生日,表达对历史的怀念和帝国荣光的怀旧^②,以此唤醒国民的民族自豪感。清

^① Metin Gurcan, “How Turkey Is Reforming Its Military,” *Al-monitor*, August 11, 2016,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6/08/turkey-military-reforms-are-democratically-deficient.html>, 上网时间:2024年5月15日。

^② 曾向红、张峻溯:《“帝国怀旧”、地缘政治机会与土耳其外交的转折》,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第68-70页。

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建筑,具有经济、宗教、文化甚至政治等多重功能。正发党执政期间,大力修建清真寺。2020 年,土耳其将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博物馆重新改为清真寺。在教育领域,土耳其在 2012 年提出要培养“虔诚的下一代”,规定进入宗教学校可以直接免试,并且不需要得到父母同意,宗教学校的准入年龄也从 15 岁降到 10 岁,并且在课程设置中加入逊尼派教义和价值观。在法律上,土耳其恢复了伊斯兰教法令的影响,通过废除戴头巾禁令、严格的禁酒令和大力修建清真寺等法令,强化了宗教在社会文化领域的作用。

文化层面的“中亚情结”是土耳其的底色。^① 土耳其号召成立突厥国家组织,力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增强本国的突厥族群身份认同,积极参与中亚事务,提升自己的影响力,配合“东向”的外交政策转型,以此来获得与欧美国家博弈的更多筹码。随着 1991 年苏联解体和独立的突厥共和国的创建,中亚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土耳其鼓励中亚国家的学生在土耳其学校接受高等教育,成立了诸如“突厥语国家大学联盟”的交流平台。2009 年,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Cooperation Council of Turkic-Speaking States)成立,该组织旨在推动突厥语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土耳其是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秘书处就设在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的推动下,“突厥语国家委员会”已改为“突厥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旨在启动突厥委员会从非正式文化协会向政治经济组织的转变。此外,土耳其还向联合国发出申请,要求将土耳其外文名由“Turkey”改为“Türkiye”,意为“土耳其人的家园”,词根有“突厥人”之意,这表明土耳其对突厥后代的身份认同。2022 年 6 月,联合国已经正式批准该请求。土耳其的一系列做法体现了土耳其试图找回族群认同,提升在突厥语国家中的地位,甚至成为突厥语国家领导者的意图。

总之,土耳其对伊斯兰教的重视以及对突厥语国家的认同表明文化自主意识的凸显和族群认同的增强,彰显了土耳其的文明自觉和文化自信。

(四) 防务上: 加快国防工业发展,促进防务自主

建设安全可靠的防务力量是战略自主的前提和基础。土耳其推行自主的军

^① 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19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381 页。

事和国防措施,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实现战略自主。^① 冷战时期,土耳其便开始调整依赖美国保护的安全政策,注重发展本国国防工业。21 世纪以来,土耳其多次公开表达了减少对外国军事援助的依赖以及发展本土国防工业的意愿和决心,这种官方形式的表达成为土耳其发展国防工业的重要动力。土耳其在《2024—2028 年战略计划》中确立了实现国防工业本土化率从 2023 年的 80% 上升到 2028 年的 85% 的宏伟目标。^② 2023 年,埃尔多安发布《土耳其世纪的正确步伐: 2023 年竞选宣言》(《土耳其世纪宣言》),《宣言》确定了土耳其在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其中关于国防工业的目标是:减少国防工业的对外依赖,进一步提高国产化速度,大力推进投资和技术创新、技术突破,实现完全独立的国防目标。^③

为此,土耳其开始发展本土防务产业和提升军力,建设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国防工业。目前,土耳其已经建立了一个能够覆盖海、陆、空等主要军种武器装备的军工产业体系,能够制造土耳其军队所需的包括战斗机、无人机、大型水面舰艇、装甲车、炮塔系统等各类军事装备。土耳其国防工业部门中比较出名的有:阿瑟尔桑军用电子工业公司、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导弹制造商洛克特桑公司、伊斯坦布尔造船厂、奥托卡公司、FASS 防务公司等,其中一些甚至跻身于全球防务百强榜。此外,土耳其还推出一系列国防工业现代化项目。2004 年 3 月 12 日土耳其海军成立“国家舰”项目办公室,制定“国家舰”项目的发展计划。2023 年土耳其的航母“阿纳多卢”号(无人机航母)已经下水,其采用的国内材料比例为 75%。^④ 航母“色雷斯”号也在加紧建造。土耳其已成为全球研发和制造无人机的佼佼者,TB-2、安卡-S、“红苹果”等无人机都是土耳其自主研发的,其国

① Murat Yeşiltaş, “Deciphering Turkey’s Assertive Military and Defense Strategy: Objectives, Pillars, and Implications,” *Insight Turkey*, Vol. 22, No. 3, 2020, p. 96.

② Stratejik Plan 2024—2028, SSB, April 5, 2024, https://www.ssb.gov.tr/Images/Uploads/MyContents/V_20240405145902497059.pdf, 上网时间:2024 年 4 月 13 日。

③ “Türkiye Yüzyılı İçin Doğru Adımlar: 2023 Seçim Beyannamesi,” pp. 254—261, 转引自梁钦、李毓博:《“土耳其世纪”国家战略愿景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24 年第 1 期,第 85 页。“土耳其世纪”国家战略既涉及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安全、外交,也是土耳其在总结百年治国经验基础上对于第二个百年的战略规划,更是土耳其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理解和筹划。

④ Burak Ege Bekdil, “Turkey Chooses Local Shipyards to Build Three Frigates,” *Defense News*, January 25, 2023, <https://www.defensenews.com/industry/2023/01/24/>, 上网时间:2024 年 7 月 24 日。

产无人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在土耳其军工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土耳其在 2017 年意向购买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双方于 2019 年完成首批 S-400 的交易。土耳其此举传递出对美国的不信赖和追求防务自主的深意。

目前来看,国防工业已经从主要依赖外国进口的采购模式转变为拥有强大研发基础和进口减少的自力更生模式,并且保持强劲的输出势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研究报告显示,2020-2024 年土耳其的武器出口份额比 2015-2019 年增长了 103%,位于全球第 11 位,进口份额下降了 33%,位于第 22 位。阿联酋、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是土耳其武器出口的三大对象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是武器进口的三大对象国。^①

(五) 外交上:推进外交政策转型,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土耳其的外交也出现显著转型。以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提出的“战略深度主义”^②为指引,土耳其推出了被称为“零问题”的周边外交政策,开始在地区乃至国际层面提升影响力。土耳其在与美国和欧盟发展关系的同时,重视与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发展,其主要目标是成为全球参与者,同时支持其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外交政策目标。“全球南方”国家被视为获取经济机会、寻求政治合法性和获得国际支持的空间。^③ 中东变局发生后,土耳其积极介入叙利亚内战,开启了外交政策的又一次转型时期,尤其是在 2016 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在“积极进取人道主义”外交的指引下,土耳其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积极介入地区热点问题和独立展开军事行动,并与美国和欧盟分歧愈发凸显。与此同时,土耳其将自己塑造成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促进者,并在国际论坛上为其主张发声,从而

^① Mathew George and Katarina Djokic,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24,” SIPRI, March 2025,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5-03/fs_2503_at_2024_0.pdf, 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20 日。

^② 在 2001 年出版的《战略深度》一书中,达武特奥卢阐述了“战略深度主义”思想(又称“达武特奥卢主义”),他认为土耳其因其历史和地理位置而拥有“战略深度”,并将土耳其列为“中心大国”,这一思想成为土耳其正发党执政后的新外交思想。

^③ Ariel González Levaggi and Federico Donelli, “Turkey’s Changing 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South,”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 Issue 4, 2021, p. 1111.

在高收入经济体和低收入经济体之间采取中间立场。^① 2022 年 2 月的俄乌冲突发生后,土耳其总统发言人明确表示,土耳其将不会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② 由此,土耳其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对俄罗斯关闭领空和对该国实施经济制裁的北约成员国。

2019 年,土耳其公布“亚洲新倡议”,增进与亚洲国家的对话和合作。特别是,土耳其通过接近中俄等“全球南方”国家来获得和美国博弈的筹码,力图倒逼美国改变对土耳其的态度和做法。在土俄关系上,2004 年土耳其与俄罗斯签署《关于深化友谊与多维度关系的联合宣言》,《宣言》指出两国都是重视安全与稳定的欧亚大国,突出了双方加强合作的意义。^③ 2016 年 10 月,俄土达成《“土耳其溪”天然气管道协议》,两国在能源领域展开紧密合作。土俄双方还在 2017 年 12 月签署 S-400 导弹购买合同。俄乌冲突发生后,土耳其在多方之间进行平衡,这一定程度上给俄罗斯带来了利好。在土中关系方面,土耳其与中国的关系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与土耳其外交政策向更加自主和不以西方为导向的外交政策路线转变有关,特别是在阿拉伯之春之后表现的更为明显。^④ 从 2010 年中土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开始,土中关系迅速升温。2013 年 4 月 26 日,土耳其成为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土耳其也因此成为北约成员国中首个确立该关系的国家。2014 年 10 月,土耳其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土耳其愿意加强“中间走廊”计划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把土中关系提高到新水平,为实现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提供帮助。土耳其还多次表示有意加入金砖国家,通过这一平台实现联合自强。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体系首次出现了有利于“全球南方”国家的重大调整、改革和发展,而“全球南方”国家也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最大推

① Federico Donelli and Ariel Gonzalez Levaggi, “Becoming Global Actor: The Turkish Agenda for the Global South,” *Rising Powers Quarterly*, Vol. 1, Issue 2, 2016, p. 97.

② Emre Karaca, “Turkiye Has No Plans to Impose Sanctions on Russia: Turkish Politician,” *AA News*, March 3, 2022, <https://www.aa.com.tr/en/russia-ukraine-crisis/turkiye-has-no-plans-to-impose-sanctions-on-russia-turkish-politician/2521887>, 上网时间:2024 年 4 月 14 日。

③ Suat Kiniklioğlu and Valeriy Morkva, “An Anatomy of Turkish-Russian Relations,”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Vol. 7, Issue 4, 2007, pp. 535–536.

④ Meliha Benli Altunisik, “Change in Turkey’s Foreign Policy: Global Shifts and Domestic Politics,”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London: Routledge Publications, 2022, p. 172.

动力。^① 随着全球治理议题领域不断增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兴起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此类问题贡献了新的力量。土耳其通过 2009 年至 2010 年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性,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加速了土耳其在全球治理方面的积极参与。^② 土耳其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在诸如伊核问题、粮食安全以及联合国改革等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想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力图改变以西方主导的不合理的治理体系。

在伊朗核问题上,土耳其对西方国家就核问题向伊朗施压感到不满,拒不执行欧美对伊朗谈判加制裁的双轨政策。土耳其认为任何国家都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力,但这些国家必须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遵守《核不扩散条约》。^③ 2010 年,伊朗、土耳其和巴西在德黑兰签署关于核燃料交换的《德黑兰联合声明》,土耳其还在联合国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的决议投了反对票。这使得土耳其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美国背道而驰。在俄乌冲突发生后,土俄双方讨论了在西方无力履行粮食协议的情况下的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推动下,联合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乌克兰在伊斯坦布尔达成《黑海谷物倡议》,目的是通过一条安全的海上人道主义走廊,恢复乌克兰的谷物、食品和化肥出口。土耳其还对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进行批评。埃尔多安曾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数量应为二十个,而不是五个,他要求在联合国框架下重组一个能够对世界“和平、安全与福利负责的”机构,并建设一个能够代表“所有起源、信念与文化的全球治理结构”。^④ 土耳其认为基于冷战时期条件的联合国安全架构的运作不符合当前的世界秩序。达武特奥卢指出:“新的全球秩序必须更具包容性和参与性……土耳其将成为那些积极和有影响力的参与者之一,他们坐在桌子旁解决问题,而不

① 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国际规则和制度为例》,载《国际观察》2024 年第 2 期,第 98 页。

② Emel Parlar Dal, “On Turkey’s Trail as a ‘Rising Middle Power’ in the Network of Global Governance: Preferences,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9, No. 4, 2014, p. 112.

③ Ibrahim Al-Marashi and Nilsu Goren, “Turkish Perception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Strategic Insights*, Vol. 8, Issue 2, April 2009, pp. 4–5.

④ Berdal Aral, “The World Is Bigger than Five: A Salutary Manifesto of Turkey’s New International Outlook,” *Insight Turkey*, Vol. 21, No. 4, 2019, p. 72.

是看着它们”。^①

三、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的动因

土耳其的战略自主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全球南方”国家的兴起为土耳其战略自主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土耳其国家实力的提升以及由此带来的认知变化是土耳其战略自主的根源,美国和欧盟等非“全球南方”国家对土耳其的不合理要求和霸权行径是土耳其战略自主的推动力。

(一) “全球南方”国家兴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一种整体结构,这就是国际体系。只有理解国际体系中发生的变化,才能理解土耳其为何能够转向战略自主。^② 冷战时期,中东地区处于东西方阵营的激烈争夺中,地区国家往往被迫在两方之间进行“选边站队”。在世界大变局下,“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进而要求重新塑造国际体系,加速了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土耳其能够以更灵活的方式谋求国家利益。这种多极化趋势突出体现在美国的相对衰落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兴起,而在“全球南方”国家中,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转型与土耳其战略自主之间的关系密切。

在土耳其的战略自主过程,俄罗斯扮演了重要作用,俄土关系的发展为土耳其战略自主提供了重要支持。^③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外交战略上出现了短暂的西方化时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执政后,开启了“东西平衡、欧亚并重”的务实外交。然而,从2008年的俄格战争到2022年的俄乌冲突,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持续恶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多次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大国博弈加剧。在此过程中,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从“转向东方”调整为“转向南方”,将本国定位为“全球南方”国家对抗新殖民主

^① Yuksel Taskin, “Turkey’s Search for Regional Power,” *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Project*, August 21, 2010, <http://www.merip.org/mero/mero082110>, 上网时间:2024年4月23日。

^②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western Order: Strategic Autonomy or New Forms of 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 4, 2021, p. 1087.

^③ Orhan Gafarli and Julia Roknifard, “Relations with Russia in The Context of Turkey’s Policy in Constructing it ‘Strategic Autonom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79, 2023, p. 34.

义的领导者^①,并着重发展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2023 年 3 月,俄罗斯公布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并指出西方已经失去了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全球南方”国家应该与俄罗斯合作共同推翻当前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建立新型国际秩序。^② 这彰显了“全球南方”国家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而土耳其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国家,受益于俄罗斯的战略转型和调整。有学者认为由俄罗斯主导、土耳其和伊朗等国参与的针对叙利亚问题的“协调联盟”表明了这些国家对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均不满,各国组成了一种弱链式联盟。^③

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新兴的全球秩序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为土耳其寻求与中国创建更紧密的关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④ 与此同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 2008 年经济危机的发生加速了美国霸权的衰落,尤其是中东变局的发生更是凸显了美国中东政策的偏颇和美国能力的有限性,体现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治理困境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在此情况下,土耳其具有更充分的战略空间和有利的外部环境来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周边地区推行更积极的外交策略,而不是被动地适应美国所提出的要求。所有这些发展都促使土耳其寻求新的机制,以确保和加强其在不断发展的地区秩序中的战略自主性。^⑤ 正如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Mevlut Cavusoglu)指出,“我们的周边地区和全球环境正在经历惊人的变化。由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位置,预见和管理周围脆弱

① Ivan U. K. Klyszcz, “It Is Not About ‘Neutrality’: How the Global South Responds to Russia’s Invasion,” *Heinrich-Böll-Stiftung*, January 30, 2023, <https://www.boell.de/en/2023/01/30/it-not-about-neutrality-how-global-south-responds-russias-invasion>,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6 日。

②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arch 31, 2023, <https://www.mid.ru/ru/detail-material-page/1860586/>, 上网时间:2024 年 7 月 20 日。

③ 孙德刚、凌胜利:《多元一体:中东地区的弱链式联盟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1 期,第 66-67 页。

④ Veysel Tekdal, “Greater Autonomy Through Closer Relations with China? Revisiting Turkey-China Engagement,” *Oasis*, No. 39, 2024, p. 105.

⑤ Pavel V. Shlykov, “The State of Strategic Hedging: Turkey’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with Russia,”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Vol. 21, No. 3, 2023, p. 136.

性和危机的能力至关重要。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必须提出新想法和新举措的时期”。^①

可以看出,土耳其试图通过与“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关系,以此来平衡甚至对冲来自美西方的影响,力图成为多国争取的关键国家。

(二) 土耳其国家实力提升带来认知的变化

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土耳其,其自身国家实力的显著提升为追求战略自主带来了实力基础,其寻求大国身份的诉求更加迫切。土耳其已经成为全球前二十大经济体,经济建设取得较大成就。2002–2021年,土耳其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4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20%。^②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了土耳其的国家实力,为土耳其的战略自主奠定了物质基础。土耳其推行战略自主有自身的利益考量,作为长期的指导原则,战略自主话语影响着土耳其领导人的认知。^③

在《2023年愿景》中,土耳其就设定了百年发展目标,即从“桥梁国家”转变为发挥关键作用的全球性力量。在2023年选举中,埃尔多安又提出“土耳其世纪”的选举宣言,重申了土耳其的战略自主,而支撑这一宏大构想的思想基础正是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形成的战略性思维。^④有学者指出,尽管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多数活动都是对其他国家行动的一种反应,但各国也试图实施连贯和统一的长期战略来实现其国家利益。^⑤战略自主是土耳其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战略”的愿景和目标就是成为具有战略主权的全球大国。在这种战略思维的指导下,土耳其开始改变一味地“西方化”和“欧洲化”

① Mevlüt Çavuşoğlu, “Opening Speech at 11th Ambassadors’ Conference, Ankara, August 2019,”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ugust 7, 2019, <http://www.mfa.gov.tr/data/BAKAN/bkon2019-eng.pdf>, 上网时间:2024年8月3日。

② Kemal İnat and Burhanettin Dura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Face of Regional and Global Challenges,” *Insight Turkey*, Vol. 25, No. 2, 2023, p. 81.

③ Şaban Kardaş, “Quest for Strategic Autonomy Continues, or How to Make Sense of Turkey’s ‘New Wave’,” *GMF Analysis on Turkey*, November 28, 2011, p. 3.

④ 刘义、崔亚平:《2023年选举与“土耳其世纪”大战略》,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1期,第36页。

⑤ Mustafa Aydın, “Grand Strategizing in and fo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Lessons Learned from History, Geography and Practice,” *Percep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5, No. 2, 2020, p. 207.

态势,转而回归伊斯兰世界,强调大国身份。正发党执政后,不断挑战世俗主义,伊斯兰意识形态成为塑造土耳其看待外部世界方式的核心变量和持久动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土耳其亲西方的思想基础,使国内的反美情绪一度高涨。此次土耳其在巴以冲突中的积极介入,就可以视为其力图在巴以问题上占据道义制高点,在伊斯兰世界中发挥领导地位。

此外,对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的传承是土耳其追求世界大国和伊斯兰世界领袖合法性来源,它要求重新定义土耳其的战略和国家身份。正发党时期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也被打上了新奥斯曼主义的烙印,土耳其正是借这种历史身份和国家认同来恢复当代土耳其的大国地位,借此介入原属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和地区。这种身份认同也改变了土耳其传统上倒向西方、远离中东的选择。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身份特征影响了土耳其的战略思维,预示着其完全西方化道路不会长久,“东西兼顾”更符合土耳其自身的利益。因此,受到战略性思维影响,土耳其在西方盟友体系下开始找回伊斯兰身份和靠近东方,在与美西方发展关系时保持战略自主。

(三) 美国和欧盟的态度促使土耳其疏远西方

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土耳其是历史上沦为半殖民地、二战后又加入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并长期积极寻求融入西方的国家。但土耳其要成为真正的西方国家困难重重,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的态度促使土耳其逐渐疏远西方。

西方在考虑土耳其的北约成员资格和欧盟成员资格的合法性问题时,土耳其则在权衡这些是否会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以及考虑退出北约的可能性。^① 虽然土耳其作为美国地缘战略中的“支轴国家”和重要盟友,但美国并未将其作为平等的伙伴加以对待,美国在 2015 年土俄“战机事件”、2016 年未遂军事政变、库尔德工人党等诸多问题上不顾及土耳其的利益和感受,而且也并未对土耳其进行有效支持和援助,土耳其产生了一种“被抛弃”感。^② 在联盟理论中,持“威胁

① 李秉忠、涂斌:《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及其限度》,载《西亚非洲》2018 年第 2 期,第 93-94 页。

② Shampa Roy-Mukherjee and Ejike Udeogu, “Re-evaluating Turkey’s Global Relationships and Its Shift Toward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Journal of Global Faultlines*, Vol. 10, No. 1, 2023, p. 91.

平衡论”的学者认为共同的外部威胁是联盟能够建立的主要原因。^① 如果盟友之间对于共同威胁的认知出现变化,那么就会影响联盟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在叙利亚战争中,美国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YPG)进行合作,而在土耳其看来,后者是构成土耳其外部威胁的重要来源。因此,土美之间关于共同威胁的不同认知构成了土耳其与美国分歧的关键,进而成为土耳其自主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原因。埃尔多安就曾警告美国称,如果美国不改变单边主义和不尊重土耳其的做法,土耳其将被迫寻找新的伙伴和朋友。^② 冷战时期,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秘密出卖土耳其的行径、在两次塞浦路斯危机中对盟友土耳其的威胁和实施的军事禁运都让土耳其深刻认识到完全倒向美国出现的问题。2016年军事政变发生后,土耳其认为政变是在美国授意或策划下进行,而美国却拒绝引渡被土耳其视为参与政变的费图拉·居伦(Fethullah Gulen),这引发土耳其的不满和不信任。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2022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8.3%的土耳其受访者将美国视为对土耳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③

此外,从土耳其申请加入欧共体至今,土耳其仍然在欧盟外部徘徊。在长期的入盟进程中,土耳其按照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推进国内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削弱军队权力,增加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权利。然而,欧盟仍认为土耳其的改革未达到欧盟标准,双方的谈判进展缓慢直至冻结。双方不仅在塞浦路斯问题、库尔德问题上僵持不下,而且欧盟对正发党采取的各项政策日益不满,更无法掩盖深刻的宗教和文化差异。在身份问题上,土耳其的伊斯兰身份被认为与欧洲身份大相径庭,不应被纳入欧盟。欧洲国家认为土耳其不属于欧洲。^④ 德国和法国一直质疑土耳其在价值观和文化方面的“欧洲性”,认为土耳其不是拥有共同欧洲身份的内部成员,而是一个存在共同经济和安全利益的“特权

① [美]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7页。

② “US Changing Strategic NATO Partner with Pastor,” *Hürriyet Daily News*, August 11, 2018, <https://www.hurriyetdailynews.com/dont-force-turkey-to-look-for-other-friends-erdogan-addresses-us-in-nyt-article-135685>, 上网时间:2024年4月8日。

③ Cem Cetinguc, “GMF: Turkish Perceptions of the EU,” *P. A. Turkey*, April 14, 2022, <https://www.paturkey.com/news/gmf-turkish-perceptions-of-the-eu/2022/>, 上网时间:2024年7月2日。

④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页。

伙伴”。因此,土耳其艰难的入盟历程使土耳其在欧洲化进程中产生了适应性压力,对加入欧盟的过程疲惫感日甚,成为土耳其脱离西方和寻求自主的重要动因。

四、土耳其战略自主的影响及限度

“全球南方”国家的兴起与土耳其的战略自主之间呈现出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全球南方”的兴起对土耳其战略自主有着塑造作用,为后者提供战略空间和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土耳其在寻求战略自主过程中的举措和表现也会对“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方向路径和政策空间。但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土耳其的战略自主仍是有限度的。

(一) 战略自主的影响

追求战略自主使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西方盟友的依赖,在大国博弈中处于有利位置,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战略空间和利好,也加速了土耳其与非“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转变。

1. 有利于土耳其在大国博弈中的转圜

在大国竞争中,“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斗争经验日益丰富,自主决策的能力越来越强,外交也日渐成熟。^① 目前,土耳其的国家身份和外交行为正在经历重塑,土耳其从亲西方的美国盟友转向“全球南方”,战略自主态势明显。战略自主给土耳其在国际体系中带来了更稳定和生存和发展空间,通过主动融入而非被动适应目前的国际形势,土耳其不仅能够避免由于美国的决策失误而带入困境,也有利于保持和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其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能力。土耳其通过战略自主,促使土耳其与“全球南方”国家经济联系更加密切。2000年,与土耳其传统上关系不牢固的南半球地区占其出口的不到6%,占其进口的13%左右。十年后,对这些地区的出口跃升至9%,从这些地区的进口跃升至22%。^②

^① Kishore Mahbubani, “How ASEAN Survives — and Thrives — Amid Great-Power Compet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102, No. 2, 2023, p. 141.

^② Ariel González Levaggi and Federico Donelli, “Turkey’s Changing 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South,”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Issue 4, 2021, p. 1111.

土耳其作为西方国家盟友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双重身份,帮助土耳其在两个层面共同获利,并且能够降低来自任何一方的约束和拉拢。一方面,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和欧盟的候选国,尽管对双方产生了不信任感,但凭借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身份定位,依然能够获得来自北约的安全保护和欧盟的广阔市场与经济援助。另一方面,土耳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使土耳其能够通过“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彰显和提升本国的影响力,并且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认可和接纳。土耳其以自身安全和发展为导向,通过多方平衡既保持了战略灵活性,也能够从中受益,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在大国竞争和博弈态势下,通过战略自主,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不再与美西方进行捆绑,减少了来自美西方的制约,降低了自身面临的风险。

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能够连续执政这本身就表明了其推行的战略自主话语获得了国内民众的认可,对他赢得总统选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土耳其以战略自主为指引,在与地区和全球大国的关系发展中重视维护本国利益,并奉行多边和平衡的政策,将其视为在外交政策中获得更多回旋机会的窗口。周边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是土耳其长期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库尔德问题上,土耳其不受美国影响,打击库尔德武装,有助于维护本国安全和周边地区稳定。

2. 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战略空间和利好

土耳其的战略自主代表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态势,客观上能为国际社会主张合作的呼声带来新力量,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且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土耳其发挥影响力提供了空间,提升了这些国家在土耳其外交中的地位,有助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土俄关系方面,土耳其更加自主地与俄罗斯互动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契机,同时为俄罗斯在美俄博弈中提供利好。对俄罗斯来说,土耳其在战略自主中寻求与俄罗斯合作能够削弱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战略竞争压力。进入21世纪,美国多次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然而土耳其在俄乌冲突发生后并未跟随美国的制裁步伐,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此外,以土耳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与俄罗斯的贸易额大幅提升,美西方通过战争和经济制裁消耗俄罗斯的企图并未达成。随着北约不断东扩,俄罗斯的战略缓冲地带不断收缩,而土耳其在战略自主的过程中与俄罗斯接近,

这可以削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围堵俄罗斯的能力,分化美国的中东同盟体系,对美俄博弈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土耳其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改善了自 2015 年俄罗斯高调介入叙利亚内战、土俄“战机事件”以来两国关系的恶化局面,双方关系回暖。此外,由于土耳其的重要地缘位置,土俄接近还可以对俄罗斯在黑海的出海口提供安全保障,保证俄罗斯油气资源的输送稳定。有学者指出,“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自主带给俄罗斯与全球和地区大国之间战略合作的机会。因为俄罗斯希望看到一个地区参与者在外交政策上保持战略自主,做出不受到美国干涉的决定。^①

土中关系方面,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在土耳其作为“全球南方”国家成员追求战略自主的背景下,中土两国的发展前景将更为可观,土耳其的战略自主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了一个机会窗口期。一方面,土耳其对中国建设性地介入中东事务持更加积极的态度,有利于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两国经贸合作、战略合作和人文交流带来了发展空间,进而有利于打破美西方国家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割裂的企图,中国中东外交战略的走向将更加明朗。另一方面,作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最大推力,“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性诉求和自觉行动能够对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影响。在全球问题领域,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这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应对。土耳其在战略自主中寻求同中国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反对西方国际政治秩序,这有助于中国建设性作用的发挥,有助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共同推动全球战略平衡和国际格局多极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革。

3. 加速土耳其与非“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转变

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在外交政策方面提到了帝国的过去和土耳其在该地区的领导作用,这导致与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十分紧张。^② 作为美国的盟友,土耳其寻求战略自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两国的分歧和矛盾,恶化了两国关系,并且导致美国开始怀疑土耳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土

^① Orhan Gafarlı and Julia Roknifard, “Relations with Russia in The Context of Turkey’s Policy in Constructing its ‘Strategic Autonom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79, 2023, p. 41.

^② Nukhet A. Sandal, “Middle Powerhood as a Legitimation Strateg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Cases of Brazil and Turke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1, Issue 6, p. 705.

土耳其的不满会愈发强烈,并表现出对土耳其的矛盾性与摇摆性认知。土耳其不会放弃自主性的外交政策和进取型外交战略,也将对美国产生出愈发强烈的“离心”倾向,但是出于各种制约因素,这种步伐会进一步放缓。这就决定了美土关系表现为结构性矛盾的阶段性爆发与短期性缓和并存,双边关系呈现出交易性和工具性的特征。^① 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土耳其与北约之间的向心力正在受到四种离心力量的影响,其中之一是土耳其越来越明显的战略自主。土耳其更加坚定地追求独立的外交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往往与北约的目标背道而驰。^② 从伊拉克战争到新一轮巴以冲突,土美关系由于上述的一系列分歧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对美国来说,土耳其的战略自主意味着土耳其不再充当美国的“马前卒”,美国将面对更加自主和平等的土美新型伙伴关系,美国必须考虑土耳其方面战略调整带来的影响,以制定符合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和相互依存关系的美国外交政策。^③

此外,土耳其也正在成为美国推行中东战略的一大不确定性因素。土耳其的因契利克和科尼亚空军基地、伊兹密尔的北约陆军司令部以及库雷吉克的美国预警雷达系统都有美国驻军。以因契利尔空军基地为例,该基地于冷战时期开始使用,是美国执行在伊拉克、阿富汗和中东其他地区政策的重要基地,然而土耳其却常常将此视为与美国博弈的筹码。在未遂军事政变发生后,土耳其当局关闭了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造成美空军从该基地出发对“伊斯兰国”实施空中打击的行动被中断。这种做法加深了美国对土耳其作为盟友的有效性的疑虑。

尽管埃尔多安依然表示不会放弃加入欧盟,然而在实际行动中,土耳其对欧盟的离心倾向愈益明显,双方在难民问题、东地中海问题、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日益加深,土耳其的做法违背了欧盟对土耳其的期望和要求,加深了

① 杜东辉:《从大西洋到大周边:土耳其复合联盟战略初探》,载《西亚非洲》2022年第6期,第153页。

② Jakob Lindgaard and Moritz Piper, “Turkey’s NATO Future: Alliance Dependency, Russia, and Strategic Autonomy,” *DIIS*, Copenhagen, 2020, p. 43.

③ Noah Ringler, “Turkey at the Crossroads: Shaping Strategic Balance in an Era of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Georgetown Security Studies Review*, December 15, 2021, <https://georgetownsecuritystudiesreview.org/2021/12/15/turkey-at-the-crossroads-shaping-strategic-balancing-in-an-era-of-complex-interdependence/>, 上网时间:2024年4月5日。

欧盟对土耳其正在经历民主倒退和日益单边的外交政策的偏见。中东变局发生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推广“温和伊斯兰民主”的政治价值观,致力于在这些国家内部发展“土耳其模式”。尤其是 2016 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加快了国内伊斯兰化进程,并且积极推行政治转型。这表明,土耳其伊斯兰化逐渐取代欧洲化的身份改造,土耳其在国内进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转型,标志着土耳其走上一条独立探索国家发展道路和现代化的历程,也预示着美国和欧盟将土耳其改造为“西方样板”的企图趋于失败以及土耳其“欧洲化”的式微,因此,土耳其与欧盟之间需要寻求新的关系模式。

(二) 战略自主的有限性

土耳其既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又通过靠近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来凸显战略自主。尽管土耳其的战略自主步伐逐步加快,但受到“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发展态势、美西方对“全球南方”国家的争夺和拉拢以及土耳其内部因素等因素的制约,土耳其仍是有限度的自主。

1. “全球南方”国家兴起的限度

土耳其通过靠近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来推行战略自主的诉求将受到后者整体崛起态势的重要影响。

“全球南方”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呈现出普遍崛起的态势,这为土耳其带来了利好的一面,然而,在现行国际体系中,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上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摆脱依附困境仍然是其面临的重要问题。很多国家在政治上仍然面临着实现自主发展的使命任务,面临着诸如民族宗教、工业化、现代化等内部治理问题的纠缠。从整体上看,“全球南方”国家并不足以对传统发达国家造成根本性冲击,甚至颠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内部来看,“全球南方”国家群体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也没有明确的成员构成,而是一个包含多元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的松散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群体。^①同时,群体内部既包括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也存在土耳其、巴西这样的中等强国,还存在大量的欠发达国家,它们拥有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以至于在很多领域都存在关键分歧和差异,很难形成统一的机制化平台。

此外,新崛起的“全球南方”国家容易受到西方国家的利用和分化,表明其具

^① 徐秀军:《“全球南方”热潮的缘起与影响》,载《世界知识》2023 年第 12 期,第 14 页。

有一定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西方国家通过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拉拢和青睐,争夺在这一概念上的话语权。如下文所述,美西方国家不愿这些国家完全自主,并企图将中国排除在这类国家之外,分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①例如,2023年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以“南北合作”为议题进行讨论,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也邀请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参加会议等。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以土耳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仍将作为美西方重点争取的对象国。

因此,土耳其通过靠近“全球南方”国家这种战略追求既不应被忽视,也不应被视为对西方的替代,两者相互补充才有助于土耳其成为全球参与者。^②

2. 非“全球南方”国家的约束

在“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以及寻求战略自主的态势下,以美、欧为代表的非“全球南方”国家极力拉拢和争夺这些国家,并不希望这些国家战略自主性过于突出。

在土耳其仍是美国盟友的情况下,土耳其的战略自主如果在美国的容忍范围之内,美国尚可进行劝说和妥协,如果超越了美国的底线和触及美国在中东的根本利益,甚至挑战美国的领导力和霸权地位,将会导致其转向批评甚至制裁的立场。一方面,土耳其的强硬态度和强势作为并不能抹杀掉土耳其对美国的依赖关系。美国在维护土耳其国家安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土耳其仍需要借助美国以实现军事、经济和政治等目的,土耳其尚无力与美国争夺地区安全主导权。尽管土耳其为实现国防装备和武器多元化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土耳其国防产品中仍存在相当数量的美式装备,土耳其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北约的安全防务体系。土耳其智库在《土耳其—北约关系 70 年》研究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北约之于土耳其的重要性以及土耳其对北约的贡献,展望了土耳其在“北约 2030 年议程”中的地位,并为深化土耳其和北约的关系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③另一方面,尽管土耳其的战略自主一定程度上受益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但这并不会从根本改变美国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土耳其仍

① 门洪华:《“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国际博弈的新图景—兼论中国的战略应对》,载《教学与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109 页。

② Federico Donelli and Ariel Gonzalez Levaggi, “Becoming Global Actor: The Turkish Agenda for the Global South,” *Rising Powers Quarterly*, Vol. 1, Issue 2, 2016, p. 100.

③ Gloria Shkurti Özdemir, *Experts Respond: 70-Years of Turkey-NATO Relations*, Found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February 2022, pp. 5-44.

是美国战略同盟中重要的一环。出于大国竞争需要,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推出所谓“新中东政策”,力图重建与地区盟友伙伴关系。美国中东战略的微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耳其战略自主的能力和施展空间。因此,尽管土耳其由于战略自主诉求而同美国的矛盾在不断加深,但土耳其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仍长期制约着土耳其战略自主的目标和愿景。对此,有学者指出,从战略依附到战略自主的转变使得土耳其与北约联盟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相互需要又决定了两者维持着“斗而不破”的局面。^①

对于欧盟来说,尽管迟迟不能同意土耳其加入,但欧盟也不愿完全放弃土耳其这个重要的一员,寻求土欧关系新模式被欧盟视为重要的议程。在东地中海问题上,土耳其与欧盟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应该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②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土耳其研究中心的伊尔克·托伊古尔(Ilke Toygur)认为,欧盟政策制定者无法再以土耳其加入欧盟为前提开展有效的外交或制定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战略。他们需把目光投向其他地方,并进行创新,以重新获得对土耳其民主倒退以及土欧关系其他方面的影响力。^③ 由此可以看出,土耳其偏离“欧洲化”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的彻底破裂,而欧盟对土耳其身份问题的态度仍然在后者追求战略自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土耳其国内因素的制约

有学者指出,土耳其的困境在于,它的政治建立在一个价值分裂的社会之上;它的支柱在于正发党和埃尔多安保持经济发展与维系政治-价值平衡的能力。^④

目前,土耳其出现里拉贬值、通货膨胀率上升和失业率增加,这对土耳其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也直接限制了国家为追求战略自主提供经济支持的能力。

① 杜东辉:《从大西洋到大周边:土耳其复合联盟战略初探》,载《西亚非洲》2022 年第 6 期,第 137 页。

② “A New Transatlantic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European Commission*, December 2,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279, 上网时间:2024 年 9 月 13 日。

③ Ilke Toygur, “A New Way Forward for EU-Turkey Relation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anuary 26, 202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2/01/26/new-way-forward-for-eu-turkey-relations-pub-86264>, 上网时间:2024 年 6 月 16 日。

④ 咎涛:《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22 年版,第 254 页。

力。从《2023 愿景》到号召开启“土耳其世纪”,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可谓雄心勃勃。但是,目前来看,《愿景》中的经济目标很多都未能实现。比如:土耳其到 2023 年要进入全球十大经济体行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5000 美元。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更何况土耳其的经济产业仍处于中低端,对于美国的经济依附性较强,长期以来过度依赖外来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未使土耳其彻底改变产业结构。因此,土耳其的经济仍面临很大的风险。土耳其目前仍是一个中等大国,中等国家的实力并不能支撑其对战略自主的过高要求和期望,这就决定了土耳其战略自主的限度。因此,尽管土耳其寻求战略自主权并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但也不能疏远西方,北约和欧盟关税同盟的身份仍然发挥重要作用。^①

土耳其的战略自主也面临内部反对派的压力。在2023年总统选举中,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获得了48.09%的选票,埃尔多安以微弱优势当选,而在此前几次选举中,共和人民党与正发党得票率相差较大。在2024年的地方选举中,共和人民党更是赢得了35个市的市长选举(正发党为24个),同时赢得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等大城市和大部分沿海地区的市长选举,并获得了大约37.76%选票(正发党约为35.48%)。^②此次选举对埃尔多安以及正发党来说都是一次重大打击。因为土耳其国内反对派支持北约,同时承认北约在为国家安全提供的威慑方面至关重要,并与美国在平等的基础上推进联盟关系,试图让土耳其重返 F-35 项目。^③ 时任土耳其共和人民党主席凯末尔·科勒奇达奥卢(Kemal Kılıçdaroğlu)就曾批评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偏离了西方的道路。土耳其好党(IYI)主席梅拉尔·阿克谢内尔(Meral Akşener)则要求埃尔多安政府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依赖,放弃 S-400 导弹,并将阿库尤核电站国有化。^④ 土耳

① Tamseel Aqdas, “The Rise of NeoOttomanism in Turkey for Strategic Autonomy in Liberal World Order,” *Journal of Security and Strategic Analyses*, Vol. 6, No. 1, 2023, p. 66.

② Serdar Dincel, “More than 48M Cast Votes in Local Elections: Turkish Election Authority Chief,” *Anadolu Ajansı*, April 4, 2024, <https://www.aa.com.tr/en/turkiye/more-than-48m-cast-votes-in-local-elections-turkish-election-authority-chief/3180814>, 上网时间:2024年9月24日。

③ Alan Makovsky, “An Opposition Foreign Policy in Erdoğan’s Shadow,” *Middle East Institute*, May 8, 2023,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opposition-foreign-policy-erdogans-shadow>, 上网时间:2024年7月6日。

④ 杨晨:《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87页。

其工商业协会作为土耳其最具影响力的商会组织,其主席西蒙·卡斯罗斯基(Simon Kaslowski)则呼吁埃尔多安政府应充分利用俄乌冲突这一重要时刻回归西方,成为北约或欧洲理事会中令人信赖的成员。^①

五、结语

在“全球南方”国家兴起和国家实力提升的背景下,土耳其的战略自主在经济、政治、文化、防务以及外交方面都表现瞩目,具有鲜明特色。土耳其的战略自主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兴起和土耳其与非“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出于各种制约因素,土耳其战略自主的步伐会进一步放缓,但总体来看,土耳其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仍强烈引导着内政和外交转型,土耳其会继续靠近“全球南方”国家,从而在多方之间进行平衡。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的目的在于纠正过度亲西方的路线,并非完全摆脱西方。因此,对于土耳其寻求战略自主的本质应该有清晰地认识,它并非完全脱离美国的盟友体系,脱离北约的安全框架,而是通过这一话语来谋求国家利益。最终,土耳其能否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取决于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双重变化,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审视。

对于土耳其的战略自主应该理性看待,不应低估其决心,也不应高估其能力,这样对于未来中土关系的发展才有裨益。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和美国盟友的土耳其在追求战略自主方面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而“全球南方”国家和美国盟友体系中的其他成员,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也有追求战略自主的诉求。伴随大国博弈的展开,美西方极力拉拢和争夺这些国家,而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和“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员,应该把同这类国家的持续合作和“三大全球倡议”落地结合起来,秉持合作共赢思维,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革,进而打破美西方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拉拢,实现中国外交战略的优化。

(责任编辑:章 远 责任校对:包澄章)

^① Sinem Adar, “Perceptions in Turkey about the War in Ukraine: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EU-Turkey Relations,”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June 4, 2022, <https://www.swp-berlin.org/10.18449/2022C25/>, 上网时间:2024 年 4 月 8 日。